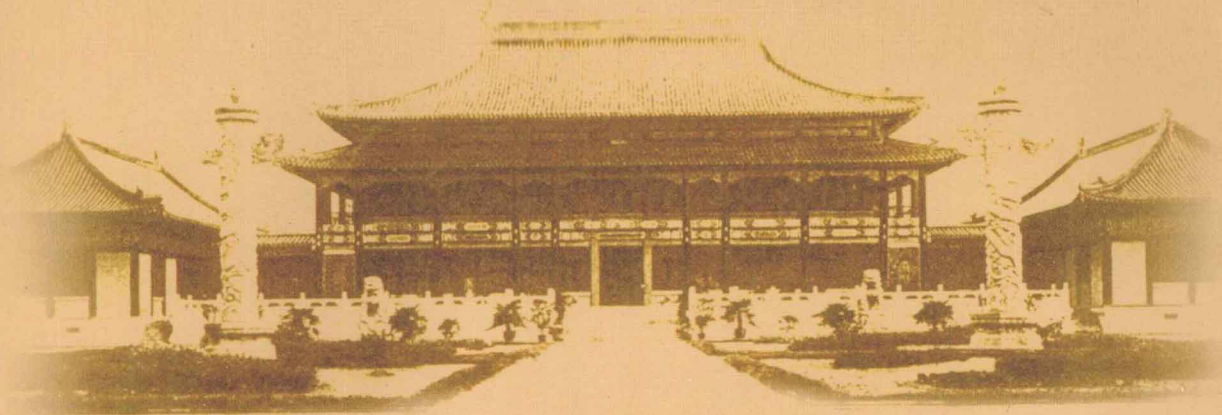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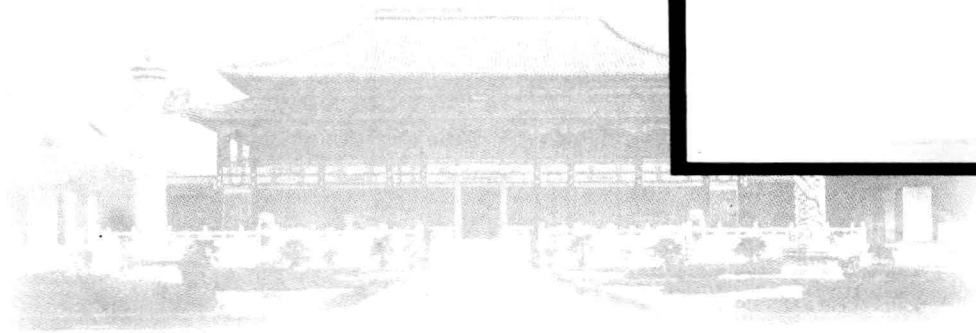


禮目表

| 紀念文集 |

国家图书馆 编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袁日禮

紀念文集

国家图书馆 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同礼纪念文集 / 国家图书馆编. —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013 - 4588 - 5

I. ①袁… II. ①国… III. ①袁同礼 (1895~1965)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07957号

书名 袁同礼纪念文集

著者 国家图书馆 编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010—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汉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X1092 (毫米) 1/16

印张 23.25

版次 2012 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4588 - 5

定价 70.00元



袁同礼 (1895—1965)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代表合影（1929年1月，前排左五为袁同礼）



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舍奠基典礼（1929年5月11日，前排右七为袁同礼）



欢迎袁馆长回馆摄影（1930年10月10日，前排中为袁同礼）



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展览会同人摄影（1930年10月10日，前排右八为袁同礼）



国立北平图书馆同人祖钱袁馆长赴欧美考察摄影（1934年2月）



袁同礼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同人合影（约1935年春，前排右二为严文郁，右三为袁同礼，右四为吴光清）



国立北平图书馆全体职员合影（1936年1月1日）

序一

2010年6月1日，中国国家图书馆召开“袁同礼纪念座谈会”，隆重纪念中国国家图书馆前馆长、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杰出的图书馆学家、文献学家袁同礼先生。座谈会在庄重典雅的国家图书馆文津街馆舍举行，在这里举办这次会议，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第一座专有馆舍，其建造施工的主要主持者就是袁同礼先生，这里也是袁先生领导国立北平图书馆创造斐然业绩、为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奠定业务格局的地方。

袁同礼先生是河北徐水人，1895年生于北京。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同年就职于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次年任图书馆主任。1920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图书馆学。1924年学成归国，任北京大学教职，讲授目录学，兼图书馆主任。同年前往广州，任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前身）图书馆馆长，并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书记。1926年回北京，先后任北京图书馆（后改称北平北海图书馆）图书部主任、副馆长、馆长。1929年3月兼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1929年9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代理馆长，主持馆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率部分馆员南下，建立长沙、上海、昆明、香港等办事处，在颠沛流离中坚持从事图书馆工作。1942年升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1949年赴美国，任职于美国国会图书馆。1951年转任斯坦福大学研究所编纂主任。1957年再次任职于国会图书馆，从事编目工作，直至1965年1月退休。同年2月病逝。

袁同礼先生是国家图书馆百年发展史上卓有成就、贡献很大的馆长之一。从1929年担任副馆长至1948年年底离馆，他主持馆务时间长达二十年。其中1929—1937年的九年，是国家图书馆历史上发展最为迅速、事业最为兴旺的时期之一。在他的领导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广泛罗致、多方培养专业人才，建立、健全业务制度，系统完善馆藏建设，提升服务水平，组织编纂目录索引，整理编印馆藏文献，支持学术研究，事业欣欣向荣，各个方面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此仅从三个方面简要谈一谈袁同礼先生对国家图书馆发展的贡献：

第一，人才队伍建设。20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人才队伍建设，历来深受业界赞赏。首先，袁同礼先生多方延聘专业人才，金石学家刘节，历史学家贺昌群，历史地理学家王庸、谭其骧，图书馆学家梁思庄、吴光清，文学史专家孙楷第，都在

这一时期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袁同礼先生慧眼识才，不拘资历，远在厦门的张秀民，凭大学期间发表的两篇论文得延聘入馆，日后成为印刷史、安南史方面的专家。

袁同礼先生注重人才培养。他请赵万里先生编纂《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为赵万里日后成为著名的版本学家奠定了基础。他以交换馆员等形式，派遣王重民、向达前往欧洲考察，他们日后都成为敦煌学方面的专家，所带回的资料推动了国内敦煌学的发展。袁先生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签订协议，派馆员到哥大图书馆学研究院学习，同时整理该校中文图书，每两年更换一人，先后奉派赴美的有严文郁、汪长炳、岳良木、曾宪三等人。此外，也大力支持李钟履、于震寰等馆员赴图书馆学专业学校进修，支持谢国桢、孙楷第等远赴海外调查书籍，对他们成为各自领域内的专家，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袁同礼先生执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二十年，馆内人才济济，既有学有所成的硕学鸿儒，也有初露头角的青年专家，学术研究风气浓郁，成果丰硕，蔚为学术重镇。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学术界，为图书馆界，为中外文化交流事业，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骨干人才。袁同礼先生的人才观，他培养人才的热心与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后来者认真思考和借鉴的。

第二，千方百计搜集文献，充实馆藏，奠定了国家图书馆的业务基础。袁同礼先生主张广泛搜罗中外古今文献，将国立北平图书馆建设成中外文献的大宝库，他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一文中说：“吾人于固有旧籍自当力为搜进，毋使远渡异国，有求野之叹；外国新书，亦应广事探求，庶几学术可与国家新运而俱进。”

袁同礼先生对因战乱被掠至国外的《永乐大典》倾注全部热情和责任去调查、收集、复制回国，在他任内，实现了大多数现存《永乐大典》的影像回归，功绩尤著。他密切关注当时学术的发展，将金石拓片、舆地图、地方志、家谱和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作为学术新史料列入收藏重点，取得了丰硕成果，今日古籍馆主要的业务科组，就是袁同礼先生设立并奠定的基础。

他多次与教育部等主管部门反复协商，不懈争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确立接受出版品呈缴的地位；积极推动国际出版品交换，与法、苏等多个国家的文献机构订立交换合同；积极吸纳图书文献的捐赠、寄存；充分利用采购经费，广搜博采各类文献，购入的重要文献，中文古籍有海源阁旧藏、明代方志、明人别集、朱希祖旧藏明清戏曲书籍、天津李氏延古堂部分藏书等多宗，西文及日文书则以东方学文献为主，尤其注重成套专业期刊。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华北危机。为使馆藏善本文献免遭日军荼毒，袁同礼先生组织馆藏善本南迁，将珍贵文献分批运至上海等地秘藏。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批珍贵藏书部分运至美国国会图书馆，安全度过了最危险的战争岁月。

抗日战争时期，袁同礼先生率领部分同仁南下，辗转西南一带，在艰苦卓绝的

环境中，仍然大力从事文献征集工作：发起国外征书运动，恢复后方各图书馆馆藏，先后收到英美赠书数万册；创设“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举凡战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无不关注，且收集范围不限于本国与中文书刊，即使是敌国、伪政府及其他中立国出版的资料，也都努力收集，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史料；锐意搜访西南文献，委派馆员范腾端等捶拓云南各地石刻，万斯年等征集西南地区方志与彝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文字文献。

第三，拓展和深化服务工作。袁同礼先生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一文中指出，图书馆的作用就是“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以一洗往日艰阨之风”。也就是说，对读者、研究人员乃至国家、政府的服务，是图书馆存在的价值所在。

袁同礼先生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期间，制订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阅览暂行规则》等制度，不断规范、改进借阅服务，多次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阅览座位，简化借阅手续，增设研究室。并根据时局的变化，开设新的服务点，比如“九一八”事变之后，即在大阅览室陈列满蒙问题及中日关系书籍，供关心这一问题的人士自由取阅；后又设立专门的远东研究室，汇集日文书籍，便利研究探讨。

在普通借阅服务之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还从多个方面深化服务。比如：编辑《图书季刊》《读书月刊》《大公报图书副刊》等期刊，揭示馆藏，引导读者读书；编纂书目与索引，便利读者查阅、利用馆藏，当时编成并出版的目录索引有数十种之多，馆藏目录著名的有《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及《乙编》、《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昇平署曲本目录》等，联合目录有《北平各图书馆西文书联合目录》、《满文书籍联合目录》等，索引有《文学论文索引》及其《续编》《三编》《四编》、《国学论文索引》及其《续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等，其中部分至今仍有参考利用价值。

当然，袁同礼先生对于国家图书馆的贡献，并非以上寥寥数语所能概括。可以说，袁同礼先生奠定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业务基础和业务格局，推动了北图业务工作的现代化，对国家图书馆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

袁同礼先生也是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的推动者。早在1918年12月，他就和李大钊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图书馆协会，并被推举为会长。1924年成立的北平图书馆协会，袁同礼先生再次担任会长。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袁同礼被推举为董事部董事、书记，代理执行部部长。1926年5月，任执行部部长。1929年1月，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会主席。1936年7月，又被推举为理事长，任职直到1949年赴美。袁同礼先生实际领导中华图书馆协会长达二十余年，协会的总事务所也因之设立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内。

他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主持图书馆发展现状调查，战时图书馆损失调查，为图书馆事业发展与重建提供基础和依据；参与筹划多所图书馆，建立组织章程，推动其按照现代图书馆的要求运作；编辑出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推动图书馆学的研究，倡导新式分类法、检字法等实用领域

的研究；培养图书馆界人才，会同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等学校或机构，通过讲习班、民众班等形式，培养图书馆事业人才；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推动协会与国际图联、美国图书馆协会等机构的合作。

袁同礼先生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推动者。他本人担任国际联盟国际文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代表，抗战时期努力促进中印两国文教界的友好合作；他所主编的《图书季刊》英文版，向国际文化界介绍中国新近出版的重要图书，抗战期间更把关注点扩展到整个文化建设领域，搭建起了一座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他多次前往欧美考察、访问，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他呼吁并推动美国图书馆协会抗战期间的“捐书中国”活动，促成鲍士伟等海外专家来华考察指导，并多次协助国际学者在中国的研究工作。袁先生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文化外交使者。

袁同礼先生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他的著述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学、目录学和古典文献三个方面。

在图书馆学方面，袁先生发表一系列文章，向各界介绍北海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及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事业发展，介绍国际图书馆界的发展与国际目录事业的发展，评述图书馆学新著与新兴索引方法，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尤以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舍落成前夕发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一文最为重要，该文认为，“一国民智之通塞，与其图书馆事业之兴衰相为表里”，指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使命，是汇聚中外典籍，成为文化的宝库、学术的重镇、中外文化交流的中介，服务学术研究，启迪民智，以期“为国家树长治久安之基”。这一论述既具体阐述了图书馆的宗旨与任务，又极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对国家图书馆的发展依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目录学方面，袁同礼先生是海外汉学目录编纂方面的大家。从1949年到1965年的十六年间，他花费大量精力，编纂了《西文汉学书目》、《俄文汉学书目》、《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英同学博士论文目录》、《欧陆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目录》、《新疆研究文献目录》、《现代中国数学研究目录》等十数种汉学书目，并重校王重民所编《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这些目录中的很多种，都已成为海外汉学研究的必备工具书，沾溉学界良多。

在古典文献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袁同礼先生也有丰硕的成果。他历时十五年调查《永乐大典》存况，先后发表九篇与此有关的文章，最后所得达三百六十七册，基本摸清了海内外所存《永乐大典》的情况，为后人开展进一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坚持不懈、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他研究了宋明清三代私家藏书及其流散的历史，撰著了《宋代私家藏书概略》《明代私家藏书概略》《清代私家藏书概略》等文章，勾勒了近古时期中国私家藏书史。

袁同礼先生献身图书馆事业、从事图书馆学文献学研究的勤奋精神和丰硕成果，是国家图书馆百年发展史上的精彩篇章，也是我们后继者奋勇前行的重要精神食粮与

动力源泉。2009年国家图书馆庆祝百年华诞前后，我们陆续组织了一系列纪念袁同礼先生的活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组织力量编纂了《袁同礼文集》，收录袁先生的论文、文章、序跋和演讲稿六十九篇，较全面地反映了袁先生的思想和学术成就，2010年6月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袁先生所编《西文汉学书目》、《俄文汉学书目》、《新疆研究文献目录》、《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等重要的海外汉学目录汇编为《袁同礼著书目汇编》，于2010年6月影印出版。这也是这些著作首次在祖国大陆出版发行。

“袁同礼纪念座谈会”是这一系列纪念活动中的重要一环。海内外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为此次座谈会撰写了纪念文章或学术论文，详细、系统、多角度地阐述了袁同礼先生的思想与成就，使得本次会议同时具有学术研讨会的色彩。美国东亚图书馆界的吴文津先生、周原先生等人士，也应约为本次会议撰写了纪念文章，尤其是年届期颐的钱存训先生，亲自撰写了纪念长文，非常令人感动。本书就是这次会议的论文集。

目前，国家图书馆的几位研究人员，正在开展与袁同礼先生有关的研究。李文洁副研究员正在撰写《袁同礼年谱》，且已形成“简编”；王菡编审等准备整理《袁同礼先生往来书信集》（暂名）。这些整理、研究的成果，将在未来陆续推出。

我们相信，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尤其是相关图书、文集、书信集的出版，将为图书馆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提供丰富的资料，有助于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史以及海外汉学的研究，有助于继承和发扬袁同礼先生的图书馆事业成就与图书馆学思想，意义重大。

这一系列纪念活动的顺利开展，得益于袁清先生及其家人提供的大量资料与热情襄助，在此谨对袁清先生及其家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当前，国家图书馆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无论是馆藏建设、读者服务、参考咨询、社会教育，还是编辑出版、学术研究，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规模和成就都远远大于建国前的水平，而且发展势头良好，前景喜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纪念袁同礼先生，一方面是缅怀前辈的功勋与业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袁同礼先生的图书馆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丰富我们自己对文化事业、对图书馆事业发展、对国家图书馆职能与定位的认识，从而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国家图书馆各项事业更加兴旺繁荣，迈向新的高峰。

袁同礼

2012年3月

序二

今年是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Princeton Global Scholar的第三年。三年里，常常能够与寓居普镇附近的袁同礼先生哲嗣袁清教授见面。这一次，袁清教授托我为即将出版的《袁同礼先生纪念文集》写几句话，虽然我生也晚，无缘亲见袁同礼先生，但我想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不仅因为袁清先生是我的学术前辈，更因为袁同礼先生也是我从事的这一学术领域最值得尊重的先驱者之一，他所经手的种种古书和编订的种种目录，更是嘉惠学林久远。作为后辈，我愿意在这里写下一些我的感想。

三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这一专业有号称“六大门”的基础课，即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其中，目录之学更是重中之重。古代中国历来有“类例即分，学术自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样的老话，意思是说，目录虽然看起来只是书目，但它的部次类别却关系到整个学术思想的变化与界定。所以，汉代刘向《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确定六部分类，就让后人看到那个时代历史学尚不独立，而算术、方技、兵书等实用知识却占据了知识世界的半壁江山，人文并没有成为中国独大的知识传统；而到了唐代，看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由附庸蔚为大国，算术、方技、兵书却退缩在诸子一部之中，则让人知道那个时代博物之学与各种技术渐渐淡去，历史学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地位渐渐提升。后代也是如此，知识变化深刻地体现在目录之中。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山海经》、《十洲记》、《神异经》这些原本在目录中归为“地理”的著作，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则把它们归入“小说家”，这说明中国对于世界的知识，已经从想像的“天下”变成实际的“万国”，而这种变化正是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说的，中国从传统转型到现代的最重要特征。

有人会把目录之学看成是图书馆的编目上架等琐碎事，把收藏古籍看成是文人余暇或秘室庋藏的玩意儿。可是，实际上知识分类恰恰是学术史的大事，而收藏古籍则是现代学术传统古代传统的凭借。当年，袁同礼先生的好友胡适提倡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就需要图书馆来收藏古籍和编制目录。当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新知识的冲击，昔日使用的经史子集四部传统知识分类，不得不向文史哲政经法等等现代知识分类转化，个人雅赏与古物收集为主的藏书楼，不得不向提供资料的现代图书馆转化，这在学术史上，就是所谓“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主持图书馆事业的学者首当其

冲，便不得不面对这种知识史上的变局。欧洲学者所谓“新文化史”研究，普遍相当关注印刷术、出版商、图书馆、百科全书以及目录学的变化，就是为了说明这种知识转变、文化转变与社会转变之间的深刻关系。中国同样如此，为了适应变局，自从梁任公《西学书目表》等等新型书目以后，中国学者便在传统目录分类上变化腾挪，直至图书馆普遍接受杜威十进制分类法或其他新分类法，用新框架对旧资源进行重新清理，这就是“知识史的现代转型”。包括袁同礼先生在内的中国学者，都曾经在这些方面努力过，他们努力地把各种中国书籍包括古籍，纳入这些新知识分类系统，尽力收集各种版本的古书，在中国建成现代的图书馆，所以学者们才说，袁同礼先生是“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领袖人物”、“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

我不想在这里重复那些故事，比如他曾经主持的中英文《图书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曾经有多少意义，他如何在1941年为保护古籍善本不被掠夺而四处奔走，几至“精神病大发”（胡适语），也不再重提他修订和编制《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善本书目》的业绩，这些在这部纪念文集中都有了。这里，我只想郑重地提出“现代”两字来讨论。应该说，传统目录和藏书楼走向现代目录与图书馆，其实也是中国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科举制度笼罩下的学问转向现代大学的学科知识、传统经学转向现代哲学、传统文章学转向现代文学、传统考据学转向现代文献学历史学，一同构成了知识史和文化史在中国现代形成的大潮流。

在这里一一列举袁同礼先生的贡献，有些不合时宜，不过，我想特别提到他所编的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即《西文文献中的中国》。纪念文集中所收周欣平教授的文章，已经详细介绍这部著录了1800种资料的书目（里面也包括中国出版的各种西文翻译论著）。我想强调的是，虽然原来这部书目只是为西方学者查检中国有关论著而作，可是现在看来，其实对中国来说，它更有一种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史的意义。这里，我想引用陈寅恪先生的术语来说明。当年陈寅恪先生曾说，现代学术必须“预流”，也就是进入国际学术大潮流，否则就会“不入流”。在学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所谓“进入国际学术大潮流”，虽然并非亦步亦趋，追随西洋东洋学术风气，但闭目塞听，不了解国际中国学的“行情”却是不行的。当年陈寅恪借评价王国维现代学术成就，总结现代学术研究与传统文史之学不同的三点，即“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我想，后两条也可以理解为，广取西洋中国学之论述，与吾国学术之著作互相比照，可能这正是当今中国学术真正“预流”的途径之一。1931年袁同礼先生在阐发北平图书馆使命时，就已经清楚地说道，“中外大通，学术界亦不闭关自守……谋万国知识之沟通，化除畛域之见，以跻世界于大同也。吾人深愿以此通中外图书之邮，为文化交通之介”。而这部编纂于1958年，多达800页以上的目录，正是这样一部“谋万国知识之沟通”的著作，现在来看虽然编纂时代早了一些，

但仍然是了解这一学术领域，特别是异域有关中国的学术史“行情”的最好工具书，令人欣慰的是，它已经作为《袁同礼著书目汇编》的第二种，在中国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

有人说，我们是没有亲炙大师的一代学人。意思是说，中国二三十年代现代学术转型时期的学术前辈，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陈垣、陈寅恪等等，也包括袁同礼先生，在我们进入学界之前便已经过世，他们的珠玉譬欬、音容笑貌，这一代都无由得见，所以不免对学术真谛缺一些深切体会，对学人风范少一些真正传续，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不过，有一些学术香火，是可以从回忆、著述、传闻中隔代延续的，那些消失的风景也许还会在种种记忆中复活，这就是我们读回忆录、看纪念集、读昔人日记的意义。也许，我与袁同礼先生还算有一些小缘分，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阴法鲁先生就让我们去看袁同礼先生的宋明清藏书史研究系列论著，当年我在北京图书馆北海本部与柏林寺分馆查找资料撰写《古诗文要集叙录》时，也时时受惠于袁同礼先生早年的编目和保存。还特别要提到的是，1916年到1920年，袁同礼先生曾经在清华工作，七八十年后，我也曾经在清华任教十余年，隔了时代遥遥相望，我总觉得我应该写一些什么，来纪念这位可敬的前辈，让不曾亲炙那一代学者的后辈学人，了解那个时代中国曾经有这么出色的学术大家，在总是“烽火连三月”的情势下，仍然艰苦卓绝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学术转型，而这一转型至今仍在延续之中。



2012年4月3日写于普林斯顿

目 录

纪念袁同礼先生	钱存训	(1)
袁守和先生：中国图书馆的先达	吴文津	(9)
永怀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袁同礼先生	徐文堪	(13)
傅振伦记忆中的袁同礼先生	黄燕生	(21)
袁同礼年谱简编（1895—1949）	李文洁	(23)
1916—1920：袁同礼在清华	薛芳渝 胡 冉	(89)
袁同礼与北京大学图书馆	张红扬	(97)
袁同礼先生对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贡献	朱赛虹	(103)
袁同礼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的地方志收藏与整理	杨印民 张 捷	(111)
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述论 ——兼及袁同礼先生的文献识见	张廷银	(127)
袁同礼与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	李晓明 李 娟	(135)
袁同礼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西文建设	彭福英	(145)
袁同礼馆长与国图金石组的发展	贾双喜	(153)
袁同礼与国家图书馆的业务建设	全根先	(159)
编印《国藏善本丛刊》史事钩沉	林世田 刘 波	(169)
袁同礼主持中华图书馆协会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李彭元	(191)